评“一亿总忏悔”与“天皇退位论”

王希亮

内容提要　战后初期,日本“战后处理内阁”为了维护天皇制的“国体”,相继抛出了“一亿总忏悔”和“天皇退位论”,旨在把战争责任转嫁在1亿国民的身上,从而掩盖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逃脱联合国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本文就这两个谬说提出的目的、实质、影响及其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予以剖析。

关键词　战争责任　“一亿总忏悔”　“天皇退位论”　“太平洋战争史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挽救彻底灭亡的命运,曾发出“一亿总玉碎”的绝望叫嚣,却终究未能挽回残局,只好乖乖放下武器,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战时内阁宣布总辞职,皇族东久迩宫稔彦出台组阁。面对战后处理的重大责任和使命,东久迩内阁理应认真总结教训、反省和追究战争责任、率领日本人民从战后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然而,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毫无忏悔之念的东久迩内阁却反其道而行之,上任伊始就抛出了一个“一亿总忏悔”论,在遭到各界民众的强烈抨击后,又抛出一个“天皇退位论”。

一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通过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台播出后,日本列岛立即陷入一片惊慌和混乱。由于连年战争,日本的国民经济已经彻底崩溃,东京等大城市处处瓦砾,国民缺衣少食,日本列岛到处笼罩着远比东京大地震时还要震惊、危惧、无奈和困惑的阴云。

当天,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任内阁总理铃木贯太郎提出辞呈,宣布战争时期的军人执政内阁崩溃。昭和天皇打破历来日本内阁产生的传统方式,指令皇族、陆军大将东久迩宫稔彦出面组阁,并指示其“尊重帝国宪法,以诏书为基本,致力军队的统制和治安的维持,努力收拾时局”。① 接着,昭和天皇又向第 88 次临时议会颁发敕语,内中要求议员们“举国一心,自强不息,培养国体,保护和救助军人遗族及伤病者,救济脱离军籍者和蒙受战灾者,以期万全”,“卿等须体会朕意,遵守道义立国之皇谟,同政府协力,朕期待亿兆一致,竭诚奉公”。② 8 月 17 日,东久迩举荐曾在战争时期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和天皇身边重臣的近卫文 担当国务大臣(相当副总理),获得昭和天皇首肯,于是,战后的第一任政府东久迩内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由于这届内阁把主要目标和精力放在战后处理上,而且,从这时起,“败战”一词几乎都用“终战”取代,所以,时人又称这届内阁为“终战处理内阁”。

面对纷乱的社会秩序以及急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东久迩内阁没有把精力放到恢复社会秩序和反省战争责任问题上,而是把主要目标放在所谓的“国体护持”之上,即采取各种手段、各项措施,千方百计地维持天皇统治的政体,诸如以维持治安为名收拢旧军人填充警察队伍;对伤残军人、遗属予以抚恤;为“恢复战灾”捐献皇室木材等,借以宣扬天皇的“御仁慈”,目的当然是为了收买民

① [日]东久迩宫稔彦:《一皇族の 战争日记》,日本周报社 1957 年版,第 198 页。
② [日]千田夏光:《天皇と 敕语と 昭和史》,汐文社 1983 年版,第 398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心。

对于刚刚结束的战争, 东久迩内阁惟恐将战争责任算到天皇的头上, 于是抛出一个“一亿总忏悔”的谬论。8 月 28 日, 东久迩在会见记者时声称, “事已至此, 当然是政府的政策不好, 另外, 国民道义的颓废也是原因之一, 此时此刻我认为, 军、官、民等国民全体都必须彻底反省和忏悔, 我相信, 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我国再建的第一步, 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①

9 月 5 日, 东久迩又在第 88 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 强调战争的结束是由于天皇的“御仁慈”和“大御心”, 强调昭和天皇是“和平主义者”, 还详细的列举了日美之间战争实力的差距, 发表了战争损失的具体数据, 并再次把战争责任推卸给全体日本国民, 称“今天我们回顾过去, 不是责备谁, 追究谁的问题, 无论前线后方, 无论军、官、民, 所有的国民都必须冷静地反省, 今天, 我们只有进行总忏悔, 在神的面前洗净一切邪心, 才能把过去当作将来之鉴”。②

在东久迩散布“一亿总忏悔”论的当天, 即 8 月 28 日, 美国占领军先遣队到达厚木机场, 两天后, 麦克阿瑟进入横滨, 在这里建立起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 GHQ)。9 月 27 日, 东久迩拜会麦克阿瑟, 报告了该内阁继续坚持治安维持法、扩充警察队伍、依靠特高警察监视社会运动以及继续关押政治犯等政治主张, 同时, 就战犯处理问题提出“自主审判”的要求。这些倒行逆施的举动理所当然地遭到 GHQ 的否定。然而, 东久迩内阁顽固不化, 继续坚持战时的一切反动政策。10 月 3 日, 东久迩内阁的内大臣山崎(原海军司令官、警视总监)竟然发表讲话称: “现在, 思想

① 《朝日新闻》1945 年 8 月 30 日。

② [日] 千本秀树:《天皇制の侵略责任と战后责任》, 青木书店, 1991 年版, 第 146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警察和思想取缔还要继续进行,对进行反皇室宣传的共产主义者毫不容赦的逮捕,另外,对企图颠覆政府者也要继续逮捕,对共产党员的拘禁要继续进行,主张政府形态变革和废除天皇制的所有的共产主义者要以治安维持法予以逮捕。”①

针对山崎的讲话,10 月 4 日,GHQ 颁布了“关于撤消限制政治、民事、宗教自由的备忘录”(又称“人权指令”),指令在 10 月 10 日前必须释放一切思想犯、政治犯(当时在押的思想犯、政治犯计 3000 余人),废除“治安维持法”、“思想犯保护法”等 16 项反动法令。“人权指令”颁布 5 天后,东久迩内阁“知趣”地宣布总辞职。

二

10 月 9 日,日本原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出台组阁。与此同时,GHQ 相继颁发了五大改革指令,并对战犯嫌疑者予以逮捕收容审查。9 月 11 日,东条英机等 39 人以“对和平有罪”的嫌疑被逮捕,12 月 2 日,皇族梨本宫守正等 59 人被收容,接着,又对天皇身边的重臣近卫文 、木户孝一等人发出逮捕指令。GHQ 宣称,“天皇制的支柱已被摧毁”。②

由日本旧政权的政治家、官僚所组成的币原内阁同东久迩内阁在“国体护持”上几乎没有什么分歧,为了维护天皇的统治体系,币原内阁于 10 月 30 日通过阁议,成立一个“大东亚战争调查会”,目的是“调查败战的原因和实相”。11 月 5 日,阁议做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内中指出,“大东亚战争是鉴于帝国周边的情势,而不得已发生的”,“天皇陛下坚决主张对英美交涉,和平的妥协”,

① 路透社东京特派员:1945 年 10 月 3 日报导。

② [日]历史科学协议会:《日本现代史》,青木书店 2000 年版,第 158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关于开战的决定,作战计划的实施,天皇陛下遵从宪法运用中确立的惯例,不能驳回大本营或政府决定的事项”。①

这就是战后日本政界一贯坚持的“和平天皇论”的最早雏型,也是币原内阁为昭和天皇圈定的“结论”。因为这一“结论”迎合了GHQ 利用天皇、推行美国占领政策的初衷,也与冷战初期西方营垒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决策合拍,所以,在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仍在政界和民间占据有一定的市场。

当然,GHQ 对币原内阁的“大东亚战争”的称谓是不满意的,12 月 15 日,GHQ 颁发“关于国家神道的指令”,指出“大东亚战争”一词同“国家神道、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紧密结合”,带有“美化圣战”的意味,明令所有公文书中一律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的称谓。这样,币原内阁的“大东亚战争调查会”才把“大东亚”3 个字删去,改称“战争调查会”,却继续进行带有主观意义的各项调查,直到 1946 年 9 月才宣布撤消。

为了“矫正”日本政界的战争认识,澄清民众对战争的“模糊观念”,GHQ 从 1945 年末开始,加强了“太平洋战争史观”的宣传力度,利用 NHK 广播连续播放《真相是这样的》长篇系列报导,同时通过各新闻媒体连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溃》,把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灌输给日本社会的各界民众。美国人“太平洋战争史观”的主要观点圈定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始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经七七事变到最后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外的侵略战争是连续性的。

第二,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在中国。

第三,美国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最大贡献”。

第四,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是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

① [日]荒井信一:《战争责任论》,岩波书店 1998 年版,第 161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而天皇、宫中派(天皇身边的重臣)、财界、舆论界等属于“稳健派”,是军国主义的“对立势力”。

第五,强调日本军国主义者“隐瞒了事实”,“欺瞒了民众”,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

以上,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恶,抨击了罪大恶极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否定了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借口和谬论。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个史观是站在美国利益和西方殖民主义利益的基础上,以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来评价这场战争,它带来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极力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地位和“最大贡献”,无视中国和亚洲抗日战场的存在,抹杀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反法西斯的历史贡献。

第二,忽略了日本对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问题。所以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没有追究日本的殖民统治责任。

第三,着意保护天皇和政界官僚、财阀等免受战争责任追究,更无意去清理酿就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土壤。

第四,忽略了追究战时体制下舆论机构、社会团体对侵略战争的责任,以及普通民众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战争等问题。

“太平洋战争史观”的结果是使本来就不认帐的战争责任者(除天皇外,还包括战争时期的政界、司法界人物、一部分帝国军人、财阀、右翼巨头等)逃脱了法律的追究,更固执地坚持他们的战争观,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战后日本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冲淡了日本国民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加害责任,并促成崇拜美国、轻视亚洲的战后日本社会风气的形成。曾任美国某新闻机关东京特派员的马库•盖因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真相是这样的》的连续播放,“我感到困惑,它是政治性的,比如,把那位像有癌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病的总理大臣币原喜重郎描写成军国主义的果敢的敌人,(广播)攻击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军人,却把天皇、财阀首脑显然的排除在战争犯罪人之外”。①

三

东久迩内阁总辞职后不久,东久迩宫稔彦拜会昭和天皇,以本人在战时曾出任军司令官,对战争有责任为由,要求脱离皇族,并提案请昭和天皇退位。为什么上台伊始为保护天皇和天皇制而效尽犬马的东久迩一反常态,竟然要求天皇退位呢?个中的内情颇为复杂。有学者分析,在东久迩内阁期间,GHQ 开始逮捕战犯嫌疑者,裕仁对东久迩内阁把当年的股肱之士交给美国人心怀悻悻,对内大臣木户孝一说,“把战争责任者引渡给联合国,真是苦痛难忍,自己一人接受即便退位如何”。② 9 月 12 日,东久迩向裕仁报告东条英机等 39 名战犯嫌疑人被 GHQ 拘捕以及阁议决议时,裕仁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称,“敌方所谓的战犯嫌疑人,特别是所谓的责任者,都是曾经尽忠尽诚之人,不忍将他们以天皇的名义予以处理,故应再加考虑”。③ 另据天皇近臣木下道雄的记录,昭和天皇对东久迩的提案十分不满,称,“关于退位之事,退位了自己当然轻松,也就不必品味今天这样的苦境,可是秩父宫患病,高松宫是开战论者,曾居军的中枢部,不适宜摄政,三笠宫又年轻缺乏经验,东久迩此次的轻举特别令人遗憾,东久迩对这些事情一点也没

① [美] 马库• 盖因:《日本日记》,筑摩书房 1963 年版,转引自吉田裕:《日本人の 战争观》,岩波书店 2000 年版,第 34 页。

② [日] 千本秀树:《天皇制の 侵略责任と 战后责任》,青木书店 1991 年版,第 156 页。

③ [日] 千本秀树:《天皇制の 侵略责任と 战后责任》,青木书店 1991 年版,第 156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有考虑”。① 可见,裕仁与东久迩内阁之间确实产生了一些芥蒂。

对于东久迩脱离皇族和昭和退位的两个提案,昭和天皇予以否决。当时的《读卖报知》报道称,“有许多皇族赞成天皇退位,东久迩是其中之一,总辞职后不久就拜会陛下,请求脱离皇族和提案(天皇)退位,当时,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由没有采纳两提案”。②

其实,战后初期,提出天皇退位论的重臣不只东久迩一人。1945 年末,鉴于 GHQ 和社会各界追究战争责任的呼声日高,天皇作为日本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作为宪法规定的三军大元帅,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是不可推诿的。于是,天皇的重臣近卫文 就建议天皇“隐退”或“出家”;内大臣木户孝一以及宫内府长官田岛道治也提出过天皇退位论。贵族院成员南原繁(东京帝国大学校长)、佐佐木惣一(京都大学教授),原文部大臣安倍能成,枢密院议长平沼骐太郎等人都提出过天皇退位说。他们的理由一是天皇作为国家元首负有败战的责任;二是容许军阀横行,负有怠慢之责;三是作为皇军的统率者要求国民服从,“陛下对献身而战的忠良将士负有背信之责”等等。他们的理由中隐匿着一个最大的目的则是希冀摆脱裕仁的战争责任的干系,退位后由皇太子即位,这样才能保证天皇统治的“万世一系”,使日本的“国体”得以维持下去。据当时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汇编了各界人士的意见:

“为了纯正天皇制需要退位,如果不退位令后来史家难以书写历史。”

“尊重天皇制,希望它永续,所以洗却太平洋战争的污垢是必

① [日]木下道雄:《侧近日志》,转引自:《天皇制の侵略责任と战后责任》,第 161 页,文中的“摄政”之说,当指如果裕仁退位,按着皇室典范由太子即位后应由皇族摄政。但因东久迩提出退位说,其他皇族又都不适宜担当摄政,所以裕仁很是恼火。

② 转引自:《天皇制の侵略责任と战后责任》,第 159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要的, 退位以后让位于太子, 可使人心一新。”

“天皇退位, 皇太子在新宪法下成为天皇, 可正确的保持天皇制, 从历史的变换和道义的战争责任上, 是最好的良策。”

“采取此策是想存续天皇制的贤明之举”① 等等。

再看《读卖新闻》1948 年 8 月 15 日发表的数据, 赞成天皇制的人数为 90. 3%。对天皇退位说, 有 68. 5% 的人不赞同天皇退位, 18. 4% 的人主张天皇退位后由皇太子即位, 只有 4% 的人主张废除天皇制。②

以上的言论和数据可以说明天皇重臣们为什么要提出天皇退位论来了。

比起天皇的重臣们, 美国人更深刻地体味到维持天皇制对于顺利贯彻美国的占领政策, 构筑东方反共产主义阵营的桥头堡, 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目标的重大意义。所以, 重臣们苦心积虑的天皇退位论的苦肉计根本用不着实施, 在美国人的庇护下, 不仅昭和天皇免去了战争责任的追究, 连(象征) 天皇制也得以保存至今。它带来的结果是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研究和争论, 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息。又因为天皇在东京审判中被免于起诉的实际后果, 甚至连作为出庭证人都没有成行, 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解决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 妥善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等都埋设了一块绊脚的顽石。

四

“一亿总忏悔”论出笼后, 就遭到社会各界和舆论机关的批判

① [日] 吉田裕:《日本人の战争观》, 第 48 页。
② 《读卖新闻》1948 年 8 月 15 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和抨击。9 月 8 日,爱知县知事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为了打赢战争,忍受了所有的无奈,今天才明白知晓国力真相的领导者们的欺瞒政策”,“为什么不信任忠良的国民,公布事实的真相,甚是遗憾”,“直到最后,指导者还欺瞒国民,实在该死”,“历来的指导当局在国民总忏悔前,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① 在佐贺县,也有舆论反映,“如果说败战的责任,应该是最高为政者的责任,今天,对民众论起败战责任没有道理”。

“一亿总忏悔”论虽然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抵制和批判,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由于美国人的主导作用和包庇天皇及政界“稳健派”的意图,使批判“一亿总忏悔”的社会舆论并未真正“到位”,甚至出现扭曲的倾向和趋势。尤其是逆反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使社会舆论和思想理论界的矛头几乎一致对准军部集团,缺乏冷静思考或自我反省意识。这样,在追究战争责任问题上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某些偏颇,其结果是转移了舆论界或知识界的视线,淡化了国民的战争加害意识,这对扭曲战后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的战争认识,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等都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模糊了“战争责任”和“败战责任”的界限。东久迩内阁抛出“1 亿总忏悔”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脱天皇的战争责任,所以故意只在“败战责任”上做文章,而不去追究“战争责任”,甚至把“败战责任”转嫁到 1 亿国民的身上。他们认为,“国民道义的颓废也是原因之一”,再就是“日本同美国在战争实力上差距过大”,所以,日本战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指导者及天皇的责任,东久迩内阁却是讳莫若深,这便带来了战争责任意识的极度混乱。

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有相当的市场,并且经过一番“包装”或

① [日]吉田裕:《日本人の战争观》第 28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演化”。曾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中曾根康弘在台上时,曾承认过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是,他又说过,“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努力,大东亚战争和我们过去的历史都被淹没在詈骂和诽谤之中……大东亚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受到了那么大的被害,死去 310 多万人,其中约 80 万人死于空袭,230 多万人战死,一半的领土被占领,迎来了这样的悲剧,从现实看,大东亚战争是误算的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国民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历史判决”。① 这里,中曾根批判战争的立足点完全站在“被害”的角度上,站在为日本国家利益和日本民族利益考虑的立场上,他认为战争使“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而且,死了那么多的人,“一半的领土被占领”,所以,这场战争实在是不划算,是一场“误算的战争”。至于被侵略的亚洲各国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和沉重代价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无独有偶,“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头面人物藤冈信胜也认为,日本参与“大东亚战争”是“战略选择错误”。他说:“日俄战争后,随着美国敌视日本政策的出笼,日本犯了战略选择错误,对朝鲜半岛的对策是否有其他选择有待充分探讨,在摸索走过曲折道路的同时,日本出现种种政策性错误,其结果突入毁灭的大东亚战争。”② 藤冈的这席话并非是指责日本的“战争责任”,只是认为日本“政策选择错误”,才“突入毁灭的大东亚战争”,而导致日本选择错误政策的责任者,是“美国敌视日本政策的出笼”。所以,他认为,日本虽然“在原理上选择了错误的战略”,但是,“由于美国对日舆论决定性的恶化”,为了“打破 ABCD 包围圈”,为了保卫自己的“南方生命线”,“才不得已与美国开战”,所以“大东亚战争”也

① [日]渡边治:《中曾根康弘から小泽一郎へ》,青木书店 1996 年版,第 377 页。
② [日]藤冈信胜:《污辱の近现代史》,德间书房 1997 年版,第 77—78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是“自卫战争”。① 可见, 藤冈的“政策选择错误”同中曾根的“误算”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在“败战责任”上做文章, 不是去指责当局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 而是责怪他们的“误算”或“选择错误”, 从而给日本带来的“悲剧”或“毁灭”。

第二,“指导者战争责任观”的形成。1945 年 9 月 22 日, 美国政府颁发了“对日方针”, 明确提出要追究“使日本国民的现在和将来都陷入苦境的陆海军指导者及其协力者”的责任。② 而对昭和天皇以及包括政治家、宫内派、右翼、财阀在内的“稳健派”则予以庇护, 这就是美国人划定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 并且成为东京审判的指导方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对昭和天皇的免责——尽管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意旨, 但是, 至少是获取了相当数量的国民的赞同③; 同时也使日本政界的官僚、财阀、右翼巨头等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削弱了对日本法西斯国家战争机器的彻底追究。在东京审判的 25 名 A 级战犯中(原 28 人, 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期间死亡, 大川周明因突发神经免于起诉), 有陆军派人物 15 人, 海军派军人 2 人, 其他才是(对美)“开战内阁”的首相、国务相、外交官之类人物。7 名被判绞刑的战犯中, 除 1 人是文官外, 其他 6 人都是陆军派人物。可以说明, 美国人认定的“指导者”主要是指日本的陆军部。

东久迩内阁的“一亿总忏悔”出台后, 既有悖于美国人的初衷, 也遭致国民的极度反感, 所以很自然的遭到抵制, 指责和抨击指导者的舆论在战后初期盛极一时。原自民党大将、现自由党代表小泽一郎曾对战争这样评价, 他认为,“日本在战前, 断绝了开国以来

① [日] 藤冈信胜:《世界史のなかの日露战争への道案内》, 载《近现代史の授业改革》第 2 号(《社会科教育》别册), 明治图书编辑部编。

② [日] 吉田裕:《现代历史学と战争责任》, 青木书店 1997 年版, 第 159 页。

③ 根据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 1946 年 2 月 3 日发表的调查数字, 支持天皇制的比率为 91.3%, 载中村政则:《占领と战后改革》, 吉川弘文馆 1994 年版, 第 137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同英美的协调关系, 自行其道, 向海外派军队, 想以武力让对方理解自己的想法, 结果失败了。个人随意地去颠倒正义, 以武力去说服对手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 "败战带来了 300 万同胞死去的结果, 由于错误的政治使国民流血, 失去了明治以来的财产"。① 这里, 小泽一郎也是从日本自身利益的得失来认识这场战争, 最后归结为"错误的政治"所致, 而导演"错误政治"的自然是动辄炫耀武力的日本军部和军阀。

"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又成为庇护昭和天皇的保护伞。战后的东久迩、币原两任内阁都炮制了"和平天皇论"的神话, 把战争责任推给军部, 推给民众。这一谬说至今还有市场。新右翼团体一水会的头面人物铃木邦男就认为,"那场战争是不好的。我们应该谢罪", 但是,"当时 90% 的国民都讲要战争(支持战争), 把天皇陛下卷了进去, 天皇陛下没有关系(责任)", 所以,"九成的国民都有责任, 要道歉应该由我们道歉, 当然, 九成的赞成者是出于大义, 出于当时不得已的状况……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天皇陛下一人"。②

第三, 模糊了参与战争、协力战争的普通国民及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战后初期, 东久迩内阁抛出"一亿总忏悔"论, 意在转移国际和社会各界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视线, 其反动性不容置疑。为此, 美国人在各家报纸连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溃》时, 明确指出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 "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对国民犯下的罪行不胜枚举, 在这些最非人道的行为中, 最严重的结果是隐瞒真实", "今天, 日本国民必须绝对的了解这次战争的全部历史, 日本国民必须了解为什么失败

① [日] 渡边治:《中曾根康弘から小泽一郎～》, 青木书店 1996 年版, 第 375 页、376 页。

② [日] 新井利男等:《右倾度 87%。》, 径书房 1990 年版, 第 109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了,为什么因军国主义而遭受到悲惨的命运”等等。①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GHQ 采取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从而把最广大民众解脱出来的方针无可非议。问题在于,由于日本国民对“一亿总忏悔”的抵制和反感,再加之美国占领军对国民战争责任的“免责说”以及“被蒙骗说”,大多数的日本国民把目光瞄向军部和政府指导者,放弃了自觉反省意识,日本国民以及社会各界在战争中应该承担的责任问题没有得到认真地解决,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趋于消极、模糊和淡化。

众所周知,法西斯国家在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没有国民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国民在战争中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认真反省战争、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制止战争、保卫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进入 80 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尖锐化,一些有良知的知识、教育界人士开始考虑日本国民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诸如家永三郎的《战争责任》(岩波书店 1985 年版)、若　泰雄的《日本的战争责任》(原书房 1995 年版)、追究日本对亚洲的战争责任民众法庭准备会编写的《战争责任——从过去到未来》(绿风出版 1998 年版)等,都提出了在战争时期舆论、教育、司法、宗教、文化艺术各界以及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问题。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也针对“被蒙骗说”发表己见,他说:“许多人都说在战争中受了骗,可是,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没有一个人说自己骗过人……无计划、疯狂的战争的必然结果,是使国民陷入不共同吃苦就不能生存的境地,尽管如此,诸位不还是相信只有自己没有骗人吗?”② 伊丹导演的这番话既耐人寻味,又很有代表意义。当然,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他们提出的战争责任问题同东

① [日]吉田裕:《现代历史学と 战争责任》,青木书店 1997 年版,第 160 页。
② [日]中村政则等:《过去の 清算》,岩波书店 1995 年版,第 85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久迩内阁的“一亿总忏悔”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痛定思痛,制止战争悲剧重演的国民良心发现,是部分知识教育界人士政治成熟的表现;后者却是为了推卸天皇的战争责任,并让一亿民众共同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实质上是否认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问题。

然而,直到今天,一些曾经参与战争的人们还以“政府命令”、“保卫国家”、“服从军令”等为遁词,只谈“被害”经历,不去反省“加害”责任;还有人以“被蒙骗”、“不知情”为由,把自身在战争中的犯罪行为一古脑推给“指导者”,或者为当年日军的战争犯罪“保守秘密”,不肯认帐和揭露;甚至还有一些人攻击敢于暴露日本战争罪行的人和事,东史郎诉讼案就是一个例证。在战后出生的一代里,也有一些人否认“责任观”的存在,他们认为战争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去追究战争责任问题等等。这一切,称作“一亿总忏悔”的负面社会影响并不过分。更有甚者,社会上的右翼势力往往以批判“一亿总忏悔”为借口,拒绝战争反省,甚至袭击坚持真理的新闻媒体。1983 年 8 月 13 日,《朝日新闻》东京本社和名古屋本社先后遭受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袭击,理由就是该报报道了日本军队的战争犯罪事实。事件后,一个称“统一战线义勇军”的新右翼团体拍手称快,还特意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未见面的日本民族独立义勇军的同志们,我们从心里赏识诸君对朝日新闻的攻击……8 月 15 日来临之时,(朝日新闻社)抛却大东亚战争是亚细亚解放战争的大义,把它称作侵略战争而奔忙运作,制造一亿总忏悔的反战舆论,超越了报道的限界,是犯罪行为……《朝日新闻》是煽动反日、排日、侮日思想的首魁,决不允许任何媒体跳梁。必须强制报道姿态,让大东亚圣战的意义在日本人中间家喻户晓”。① 在这里,右翼们从反向思维的逆反心理出发,也煞有介事的批起“一亿总忏悔”论来,甚至把

① [日]铃木邦男:《新右翼——民族派の历史と现状》,彩流社 1998 年版,第 235—236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它视作“反战舆论”，归根结底是为了否定战争责任，为“大东亚圣战”歌功颂德。也足以证明“一亿总忏悔”论的流毒非浅。

最后，还应该强调的是，为了抵制“一亿总忏悔”论，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把普通的日本国民认定为“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不仅对侵略战争不负有任何责任，而且，同亚洲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受害者。这样，作为“牺牲者”的日本国民当然无须去反省战争，无须去检讨自身在战争中的责任。特别是经历过东京大空袭、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以及冲绳决战的民众，“被害”意识更是强烈，日本的普通国民也往往把“世界唯一被爆国”（原子弹）作为“被害”的最大“根据”，强调日本国民的“战争被害”，却把作为侵略国家国民对亚洲被害国家和人民应负的“加害”责任弃之一边。这种“加害”与“被害”意识倒错的思想根源，依然是“脱亚入欧”的信仰观念在作怪，即强调本民族利益至上，固执地坚持“日美战争说”，只承认日本输给美国，蔑视和轻视亚洲人民的存在。有日本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能否认的是，从根基上维持15年战争的日本国民的心理要因，在于根深蒂固的蔑视亚洲人”，“由于轻视亚洲的‘太平洋战争史观’，我们思想中的脱亚入欧的思想，从战前延续到战后”①，成为取谅亚洲人民，推动友好交流的最大思想障碍。这该是“一亿总忏悔”论与“太平洋战争史观”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影响。

（作者王希亮，1946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兵）

① ［日］大沼保昭：《东京审判から战后责任の思想～》，东信堂1997年版，第57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